

梦中的那片厂房

□万强

清晨,我挤上2路公共汽车,在古田二路下车后,急匆匆地步入路旁的一家工厂,换上工作服,在冲压声、切割声、焊接声和车钳刨铣混响声中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当从睡梦中醒来,我不禁纳闷:为何近段日子我会隔三岔五地梦见那间厂、那群人、那些事。不只最近,这些年来,我也曾一次次梦中国“古田”,脑海中锁定电机厂。

曾经的这家厂子,鼎盛时不过三四百号职工,虽然我曾经只是其中的几分之一,但在我的心目中,那片厂房却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手把手教我磨钻头的师傅,一同参加技术比武的师兄弟,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厂长,耐心讲解电机工作原理的总工程师,同骑自行车到民族街参加文学讲座的诗人,收发室满口乡音的大妈,一幕幕久远的情境,都时不时地蒙太奇般在我的梦中闪现。

记得那是1977年仲春,作为返城知青的我被分配到位于汉口古田二路的武汉电机厂当工人,踏进厂区的那一刻,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无法抑止地在周身扩散,从此我可以和父辈一样,成了工人,有了工作,可以按时领工资。更重要的是,我开始有了一个新一个的梦想。

就像新兵需要在新兵连集训,40名新工人在铸造车间锻炼了几个月后,我和年龄相仿的王奇和建新被分配到模具车间,跟着年近不惑的钳工班长当学徒,3个不到20岁的后生成了师兄弟。庆幸的是,我们仨是真的遇到了一位宝藏师傅,他不仅技术了得,而且带徒弟也很认真,锯圆钢时,他示范锯钢运行的姿势和用力;锉零件时,他会纠正握锉刀的姿势和出力的劲道;在砂轮机上磨钻头,他则会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打磨出最佳角度等等。但是,我犹豫要不要说出这个“但是”,我还是说吧,毕竟人无完人。

班长师傅这人最明显的缺点,就是中午下班铃一响就和几位师傅凑到一堆打扑克,同时总不忘吩咐徒弟拿来他的碗到食堂排队打饭,一周六天,几乎天天如此。不知是不是事情太多,时不时会忘了给饭菜票。这样一来,最先受到吩咐的建新终于在半个月后找了个理由中午回家吃饭,于是他找了个借口不在食堂吃午饭,这样一来,听从吩咐的接力棒不可避免传到了我的手上。这情形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我最后也找理由当了“逃兵”。虽然我们仨私下对此略有微词,但师傅对我们仍一如既往地严格。三年学徒期满之际,同批进厂的青工进行了一次技术比武,同时也作为晋升一级工的考核,结果在模具钳工的比试中,我们师兄弟分列前三名。现在回想起来,不就是打个饭吗?如果再能遇见这样的师傅,我肯定求之不得。

出师不久,厂里新调来一位厂长,姓何,50岁上下,据说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役。他个头不高,说话轻言细语,工作之余,尤其喜欢与年轻人扎堆。有一年春节,他特意邀请了一群平日多有接触的年轻人到他家做客。我记得众人举杯之时,他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发生在朝鲜前线的一件趣事;也是春节期间,在中朝两国军人的联欢晚会上,一位朝鲜女军人用咬字清晰的汉语普通话报幕道:“下一个节目,男声一个人唱,让我们一起拍巴掌。”他话音刚落,众人捧腹大笑。

此后不久,何厂长视力日益减退,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是颅内肿瘤压迫视神经,于是住院手术,许多年轻人自发前去探视。出院后,他曾拄着拐杖专程来到厂里,一个个车间转,忙碌的工人见状纷纷褪下帆布手套,握手或问候。一位听过那个段子的青工上前打趣道:“何厂长,您今天表演的可是男声一个人转哟。”

转年,厂里推荐我参加上级技术部门举办的模具设计培训班,与此同时,厂部的刘干事也邀请我加入了文学兴趣小组。那段时间,我不停地在培训班和民族街的文学讲习班之间进行切换,工作日上午机械制图课,听姚总工讲解电机的工作原理,转子和定子的相互作用。一到轮休日,不是到民族街文化站听武大中文系教授或《芳草》等期刊的编辑谈美学和文学创作,就是与厂内的几位文朋诗友一道读佳作,谈创作。直至今日,我深感当初的忙碌和付出都是值得的,毕竟在那块土地上,我种下了梦想,并使之生根发芽。

此后的几年中,因为在报刊上发了些诗,收发室那位乡音浓重的大妈时常让人通知我去领取样刊样报和稿费单。相熟以后,有一次,她拿出一张稿费单递给我道:“你一个月能写十几吊钱不?”我摆了摆手答:“不是为稿费,是业余爱好。”

大约是1986年四五月间,因连日大雨导致厂区内涝,厂里迅速组织起一百多人的青年突击队,一支支身着雨衣、赤着双脚的队伍蹬水开进多个底楼仓库,不分昼夜地来回搬运、抬高货架,终于抢在水位升起之前将所有物品转移到安全地带。

也是这一年,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这个令我留下诸多念想的厂子,是否就因此,这个地方的那些人和那些事,总会占据我的梦境,挥之不去。正如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的诗句: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成为亲切的怀念。

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成为亲切的怀念。

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成为亲切的怀念。

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成为亲切的怀念。

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成为亲切的怀念。

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成为亲切的怀念。

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成为亲切的怀念。

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成为亲切的怀念。



柔软与坚硬

□温亚军

柔软

午后,天空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北部湾惊涛骇浪。望着雨中的大海,我竟然想起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那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对于远离大海,只见海涛叠浪的我这个北方人来说,这也是壮丽的景象,却心怀一丝志忑。还好,暴雨来得快歇得也快,乘车时我担心下这么大的雨,海边浪急,怕到时下不了车,浪费了有些急切的心情。这天气,果然是通人情的,车行至白浪滩,雨势弱得只剩几丝银线,可以忽略不计,可我还是打了把伞。好吧,我的担心纯属多余。

由于刚下过暴雨,白浪滩果然风大浪急,一排紧跟一排的白浪滚滚而来,壮观是够壮观,但涛声也够骇人,比打雷闪电还要惊心。把目光从白浪尖收回,投至海滩,宽大平缓,有一瞬的诧异,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居然是黑色的沙子!这颠覆了我的认知,还取名为白浪滩,好像这片难得一见的黑色沙子,单纯是为了衬托白色的浪涛一般。真是稀奇。

搞不明白,为什么白浪滩的沙子要这么独树一帜?询问当地人,说海滩的这些沙子中富含钛矿物质,将沙子的颜色也带偏了,是海岸极其稀少的黑沙滩,非常珍贵。所以,夏天在这里做钛沙浴,是最理想的美白沙疗,而且纯天然。只需在沙滩上挖个坑,人躺进去,用钛沙把自己埋起来,整个脑袋在外面,整个身体中分泌出的汗液等酸性物质,可以催化钛与氧的反应,从而起到美白皮肤的效果。沙浴数小时,人体皮肤能感觉到明显的爽滑感,如涂凝脂,比抹了任何护肤霜都要舒坦。在车上专业人士介绍钛沙知识时,我的心一直被暴雨攥着,错过了普及机会,这会儿来了兴致,只是暴雨驱散了游人,黑沙滩上湿漉漉的,天空也一直阴着脸,不见一丝阳光穿透云层的迹象,这种天气不会有人把自己埋在湿漉漉的沙里做沙疗的。当地人说,要是天气晴好,白浪滩距城区只有二十多公里,驾车需半个小时,防城滩本地的许多女性赶过来做沙疗,也有不少外地人,黑沙滩上躺满了皮肤白皙的女性,把白色的海浪都比下去了。尤其是午后,太阳越大,沙疗效果越好,来的人更多,那场面怎一个“壮观”了得。

这个阴雨天的午后,我们是无缘见识比白海浪更壮观的沙疗场面了。不过,阴雨天的白浪滩倒别有一番情调,海面浪涛翻滚,波光粼粼,似无数的宝石在眼前闪耀,巨大的浪涛声,似乎在诉说着什么,一浪紧跟一浪,一浪高过一浪,浪花白皙透亮,像一片毫无顾忌绽放又暗藏了心思瞬间消逝的花朵,让人怦然心动之余又怀了几丝捉摸不透的遗憾。黑色的沙滩因暴雨的冲刷,平坦如砥,黑沙柔软舒适,踩上去让人心情变得轻松愉悦。看着海浪一波一波地拍打在黑沙滩上,听着它们的吼声,一天的疲惫都被冲刷干净了。

我抓起一把黑沙仔细端详,沙子细如面粉,不难想象这种沙子与人体接触的那种细腻、滑润感,能使人情绪彻底松弛,深呼吸几口新鲜的海风,充分享受到大自然的美好与爱抚。

要知道,万物的风华皆在大自然中,大自然确实孕育和充盈着万物的风华,“春夏秋冬皆可入画,雨雪风霜自然有情”。只不过,这是自然平和、四季坦荡的时候,而世间万物,又哪里是一望无际的平静坦荡。人有喜怒哀乐,人间有悲欢离合,自然界的情绪更是丰富多彩,不同的地理环境,不一样的气候变化,衍生的情

柔软

岭上开遍映山红

□姜洪

从壬寅年盛夏起,一部小说对我构成一个小小的谜团。

时有中原之行。那天傍晚,在洛阳老城吉市胡同一家旧书店,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我见到一部矛盾的小说集《蚀》。这是《幻灭》《动摇》《追求》三部小说的合集。就版本而言,它并不珍贵,但小说写于1927年秋至1928年春,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似不多见的“湖北叙述”。

关于《动摇》,矛盾先生后来在《茅盾论创作》中谈及:《动摇》是借一个小县城发生的故事,反映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革命与反革命斗争之尖锐与复杂。《动摇》和它的姐妹篇《幻灭》与《追求》都是企图反映1927年前后的中国革命形势。但正面描写那时期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只有《动摇》。小说里有一个女性角色,名叫钱素贞。而小说展现的那个历史时期,湖北南部“一个小县城”:蒲圻县,也有一个女英烈,名字和书中人物几乎一模一样,叫钱素珍。她是蒲圻第一个女共产党员,革命三杰之一。她的部分遭遇,也与小说相似。

《动摇》中的“钱素贞”,只是县解放妇女保管所干事,而蒲圻英烈钱素珍,却是一位革命女性。她幼时随父从湖南逃荒到蒲圻,为人童养媳。1926年冬,蒲圻农民运动兴起,钱素珍参加县妇女协会筹备工作,后加入中国共党,任中共蒲圻县委委员,分管妇女工作。在钱素珍的努力工作下,短短几个月里,全县发展妇协会会员千余人,车埠、新店、羊楼洞、汀泗桥等地都成立了区妇协会。她被群众誉为“蒲圻革命三杰”之一。党的八七会议后,她参加鄂南秋收起义,担负进攻接头使命。起义失败后,转移武昌,入纱厂做工。1928年初,钱素珍在武昌陶马场附近秘密接头时被捕,遭敌人严刑拷打,铁丝穿透锁骨,又被割掉双乳,最后牺牲,英勇而坚定。

茅盾还说:“《动摇》的时代正表现着中国革命史上最严重的一期。”《幻灭》和《动摇》的背景正是1927年春夏之交,武汉政府蜕变的前夕,发生在湖北地区的矛盾和斗争。又说,“1927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

当时,作为左翼报纸主编的他天天收到、看到消息,包括反革命“有史以来所仅见”的残酷:杀人如刈草,挖眼拔牙、割肠剖骨,活埋火焚。当时的湖北,除武汉三镇及咸宁等四五县外,满目白色恐怖。“这些小县城中发现的动乱和惨剧,那里同志们的不幸遭遇,后来我写《动摇》时就取材于这些事件。”其中有几段重要事实,即根据当时所得而未能披露的新闻内幕。

作者隐晦其辞:在对于湖北那时的政治情形不甚熟悉的人自然是茫然不知所云之,尤其是假使不明白《动摇》中的小县城是哪一个,那就更不会弄明白。那么究竟是哪一个小县城呢?小说中有“以为是上游军队(指夏斗寅部)逼近来了”“但是离我们这里还有五六百里水路呢”,以及“可是汽笛声已经远远地来了,不到三分钟,列车进了站”等描写,由此判断,是长江边兼京广铁路线上的一个县。当时的湖北,同时具备这两者的,大约只有蒲圻,同时敌人,小说肯定还杂糅了湖北其他小县城的情形。

钱素珍烈士传中,这样的记述,让我肃然动容:烈士自从离家出走参加革命后,仅两次回家,看望年幼的女儿菊英。作为一位年轻母亲,她负有革命,却亏欠女儿。她的事迹,直到今天仍感动着人们——如今,她是赤壁市正在创作的一部红色舞台剧的主人公。

1927年10月,正当茅盾在上海写作湖北题材小说的时候,中共湖北省委完成一份报告,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其中一段,谈到暴动第一枪——蒲圻中伙铺劫车时描述:派去做军事工作的刘镇一,露天月牙形的海石构造的露天炮座发射台,长7米,宽3米,四壁高约1米,后壁有拱门形弹仓。每座炮台的炮身,都是从英国进口的一百毫米口径粉炮,装备了一至三门。炮座底下为深6米的地下室和弹药仓,当年有兵士把守,时刻准备打击海上的来犯之敌。

四座炮台与越南隔海相望,国防位置相当重要,与企沙石龟头炮台遥相呼应,虎视眈眈,有“龟蛇守水口”之称。如今,这些炮台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洗礼,炮身被风雨侵蚀,但历史的痕迹不会被时间消弭,它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而是防御外敌人侵的有力见证。

此时,夕阳如血,将白龙台渲染得更加庄重、威严,站在主炮台遗迹上,望着远处波澜壮阔的大海,耳畔响起海浪的巨大涛声,似乎能感受到那一股微弱挨打的历史中,驻守炮台的勇士们仰天高唱的英雄气概,壮怀激越的保家卫国情怀。

我相信,他们的牺牲,正是因为对革命的忠贞坚定。

同样找党的,还有卢德铭等三人。那是1927年9月1日。他们从江西修水经长沙,到达武昌。在汉口鄱阳街附近,他们找到中共湖北省委。向警予同他们见了面。向警予原是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曾任中央妇女部长。是年9月,她刚接办湖北省委机关报《大江报》大量报道“湖北的革命潮”,如“贺龙革命军逼近新堤”等消息,鼓舞革命者。

卢德铭率领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前往江西南昌参加起义。然而,当部队抵达奉新县时,得知起义部队已南下,未赶上南昌起义,只好改变计划,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休整待命,三位军政主官则被上级命令离队。向警予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严肃地指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又说,“你们不应该离开部队”。次日,她代表湖北省委,向卢德铭等人传达了意见,让他们立即返回原部队,并给他们配备了相应的干部和经费。

卢德铭一行从武昌乘火车,到蒲圻赵李桥下车,过羊楼洞,经崇阳、通城及湖南平江,直至修水,一路上出生入死。随后,卢德铭作为总指挥,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所部成为起义中一支宝贵的正规武装。积极主张、支持、帮助卢德铭等警卫团,是向警予对1927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乃至对中国革命作出的意义深远的贡献。

8个月后,1928年4月,向警予在武汉被捕,不久,遗下一双儿女而牺牲。消息传到遥远的莫斯科,刚参加中共六大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蔡和森,写下一篇文字,沉痛追忆这位曾经的革命伴侣与战友——

“……她的感情热烈得很,她为国家大事,常常号啕大哭。她相信所谓‘教育救国’,她绝对的与一般娇弱的女学生不相同……”她真实无比,她异常的勇敢,同时又很细腻……她每一兴奋的时候,便不认识任何险阻与艰难。“警予责任心极重,同时好胜的‘野心’亦极强,因为她自幼以来便养成了这种心理。自与和森恋爱及参加实际工作后,她精神上常常感受一种压迫,以为女同志常不能不如男同志,在她看来仿佛是‘奇耻大辱’。同志们说她她是女同志中的最好的一个,她便愈不满足……”她纵然禁不住自己愈加痛苦起来,同时又愈加强固了自己只有为革命而死的决心,这便是警予最后两年奋斗的革命生活之缩影!”

这是一个革命女性的生动画像,典型样本。

卢德铭等返回湘赣边界经过一个小车站:蒲圻中伙铺,中共鄂南特委书记吴德峰正驻此,领导鄂南秋收起义。来鄂南前一天,吴德峰通知中老人之命,他悄悄举行了没有花轿、花烛、贺礼、贺客的婚礼。次日凌晨,他化装成一个偏僻小站登车赴蒲圻。他的新婚妻子戚元德则奉党组织之命留下,到一所靠近刑场的小学去任教。在《吴德峰》一书中,戚元德回忆了亲睹许多革命者英勇就义的情形:

一位女革命者宁死不屈,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革命胜利万岁!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面对敌人的枪口,对跪着哭喊妈妈的孩子说:不要哭,不要为你们的妈妈难受,你们不要跪着,要站起来,挺起胸膛,继承妈妈未完成的事业!还有一对年轻夫妇,为即将举行的暴动制作炸弹,不慎发生爆炸,敌人迅速赶到。撤退时,他们放在阁楼上的女婴来不及及抱走,被敌人搜出。敌人举着寒光闪耀的刀,喊道:不来领就砍了她!婴儿哇哇啼哭,年轻的母亲就在人群中,心如刀割,为了不暴露组织和同志,强忍泪水,咬牙离开。她和孩子,从此生死两茫茫……

另一位女革命者,1927年初夏平息夏斗寅叛乱时,作为茅盾曾任教的武汉中央军政学校的一位女兵,到过蒲圻。她后来有一个广为人们知的名字:赵一曼。她被派赴白山黑水,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壮烈牺牲前,她曾写下一篇简短的示儿书: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对于孩子无法尽责,直至永不相见,岂止赵一曼,还有无数义无反顾的革命母亲。

一位当代著名作家在她的长篇小说里,曾写到蒲圻一种植物:暮春时节,山冈上的杜鹃花盛开。杜鹃花,岭上开遍映山红。它们美丽、沉静、坚定,无处不在,就像无数革命中的女性。